

G. 史坦因著
榮 蓀 譯

通往延安的大門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二——

· 晨 社 ·

201.3/4249:2

門大的安延了進跨
—— 二之戰挑的國中色紅 ——

著 因 坦 史 · 室 根
譯 薔 紫

目 錄

一	通過封鎖線.....	一
二	自給自足的士兵.....	九
三	不愉快的事情.....	一九
四	這就是延安.....	二六

一 通過封鎖線

在我作爲駐外訪員的二十年中，我通過了不少的前線，但我從沒有覺得像這一次通過那個杳無人跡的緊密封鎖着的中國兩大部份之間的邊境時那樣來得窘迫。我們停在黃河的一個荒野的山谷間，那裏，一羣閣將軍部下的軍政長官已經集合了起來向我們告別。

在兩邊險削和蒼涼的山頭上，是望而生畏的碉堡、戰壕、還有幾個步哨。在黃河的渡口看不見一個居民；雖在平時，這裏的商旅是很熱鬧的。

一天前，一個兵士早帶着一面議和的白旗，向中共通知了我們的到臨；共產黨以爲我們是從別個方向來的，並且還派了一艘大船到黃河那邊來特別保持兩方面的接觸。

十六個船夫辛苦萬分地搖着我們橫過了急流。他們用全力拖棹，帶着明快的，美麗的節奏，唱着古代的船夫曲，聲音宛如原始人向原野的禱告。

在另一岸，四個孤寂的人影，慢慢地移到河灘來迎接我們了。怕羞的，友誼的微笑，生疏的握手，和差不多簡略得不可相信的招呼，是中共區對我們的歡迎。沒有通常的交際和鞠躬，不交換名片也沒有嚴肅的，含糊不清的客套。

對於我們經過的每一個地方所遇到的那些盛大的招待會，集會，遊行，和歡呼的行列，我們真覺得膩了。現在遇到的雖迥相反，我們終在感到困惑之外也感到了輕鬆。

『這地方叫做冷水岸。』我們隊伍中的一個國民黨員，帶着生硬的微笑說。

我們靜靜地爬上斜坡。跟着四個安閑的，穿着藍色制服的同志，走到了一個像是紀元前的小小的村莊里。

幾排窯洞，前面是牆圍的農園和泥築的馬房；一個敗壞的神座，像是給村上集會時作演說用的講台；幾個孩子在小廟的石階上嬉戲着，一個八路軍的士兵在村裏的高山崗上巡邏。這就是我們在中共區停留下來過第一夜的地方。

幾個農民已經替我們出清了他們家中磚造的床。每一只床大得足夠睡四五個人，佔據了大半個窯洞。靠牆整齊地堆着他們的農具，家具，一捆捆的乾菜和儲藏食物的桶。在邊區所過的愉快的第一夜

和冷水岸窖洞中那青草混和着泥土的氣味，將要在我的腦海裏留下永恆的記憶。

在窖洞前的小小農園裏，他們爲我們安放了清潔的草蓆。我們就在這草蓆上舒適地伸展着腿和臂。臉盆盛着湯麵蔬菜和炒蛋，用不着吩咐，就會送來作我們的晚餐；吃了二星期豐富的中國酒菜，這些小菜反很適口。

在園子裏，農婦們安靜地繼續在紡織、煮飯、和看護小孩，她們不大注意我們。從田野歸來的男人，給我們一個友誼的招呼之後，就把農具放到屋子的角落裏（這些農具似乎非常新而且是近代紀了的），去照料他們的牲口。生活像通常一樣地過去。沒有一個人爲我們而騷擾。

第二天早上，士兵帶着爲我們去延的五日騎程所用的馬和騾子來。士兵們顯得是飽經風霜的和營養充足的樣子；穿了麻鞋和寬大的藍色的綿布制服，佩着中國正規陸軍的紅色領章。

自一九三七年抗日統一戰線成立以來，中共部隊帽上的紅星已改換了中國國旗上的青天白日章了。但是這些紅色領章——像是比國民黨軍隊的規定要大一些，並且閃耀得更見得紅，因爲他們沒有那些通常的階級的標誌——似乎有特別的意義。和有些兵士們身上，子彈帶上那閃耀的紅布一樣，這些領章像要表示出共產軍的特色和他們對於過去的懷戀。

兵士當中的一個就是王震，膚白，強壯，普羅列塔里亞型的三十四五歲的人，有着突出的牙齒，智慧的眼，準備着的笑容，和大而暖和的握手。

他帶着單純的友誼來歡迎我們，立正着，把手放在帽旁，『奉我的總司令朱德同志的命令，』他給了我一匹從日軍奪過來的馬。

兵士們指點我們越過了山崗削壁的山谷，穿過了沉澗般的山谷。他們都帶着日本的來福槍，或毛瑟槍，有幾個還有日本軍官用的長的武士刀，像槍一樣地掛在肩上。他們都是活潑、愉快的，經常唱着動聽的游擊隊歌。

土地是貧瘠的，有許多是半荒蕪的不毛之地，土是乾的黃的。『整個邊區全是這樣的，』王震說對我們說：『泥土的貧瘠，和因此而形成的人民的落後，是我們後方根據地的主要問題。但是我們解決了這些，像我們解決了別的問題一樣。』

比起同樣的毗連着的國民黨區域來，這裏已有了顯著的進步；一部份半荒蕪的，比另一岸大多了的土地，已經生長着一片青綠色的小麥和玉蜀黍。這樣開墾空地或荒地的工作已經進行五六年了。

我們常常穿過一大羣的農民，他們正在那麼傾斜的，不能用牛馬耕作的山坡上掘地和鋤草。『這些是「變工隊」，是我們所號召的許多自動合作的方式之一。』王震解釋着：『這使人民的生活起了大的變動，十二人一起的工作至少可抵十六人個別所作的工作。大多數的家庭都有了比平常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收穫。我們幾年來得到了好的天時，這大大有利於我們的開荒工作。大部份農民還是迷信的，他們說：「自從毛澤東來過後，就風調雨順了。」』

跟我在中國別處所看到的比起來，這裏的農民好像有較好的供養和衣著。他們似乎有更多的牲口。植綿是初次被介紹進來的，紡織是復活了，學校的數量增多了。總之，比一比我們經過的另一岸，這些難看的小小的窯洞的村落裏，是有着更多的生氣的。

我們所遇見的一些村長，給我們的印像是一些新型的，機智而實幹的貧農型的人物。他們之中，大多數是共產黨員，本地人。在紅軍長征到這裏之前，當這個邊區還是「蘇區」的時候，他們進行過殘酷的土地革命。但是現在我們聽說，延安當局在各地所發動的參議會的選舉，完全是自由和民主的，而且共產黨員的席數從不超過三分之一，如果超過了，他們將放棄自己的席數，給得票次多的非黨候選人。

在會議裏跟共產黨員坐在一起的許多人，據說都是從前的國民黨員。同時，我們還聽人說，大部份動員人民努力生產，教育，互助工作，而且對於自治政府和延安「新民主主義」的其他一切政策發生很大興趣的新的「積極份子」，也都不是共產黨人自己。

這一切都是非常新奇的，我所得的印象，也是非常不夠讓我對我所聽到的，關於共區進步都斷定是真實的，這好像是不能令人相信了。但這些小小的窯洞村落，比起對岸的村落來的確不同；這裏更活潑，而且一點也找不出有什麼拘束的現象。

在這些愉快的馬背上的日子裏，王震個人對我比別的任何事物都更有興趣。這平凡的難看的模範兵

士，據說是一個旅長和包括延安在內的，邊區四分之一地區的防守司令，他有些不平常的吸引人的東西。他耐心地敘述着他和日軍的戰鬥，和他管轄下的地區內農民的經濟和文化的進步情形。

在以後幾個月的交往中，我才全部明白了，他是過去和現在的中國共產主義的化身。並且和許多戰鬥者一樣，在中國革命的事業中，他也担任了典型的一部份。這些對於王震，（且不管他的真實的人格，）似乎並不是例外的。

一個下午，我從他那裡得到他的生活史，雖然，他不想說他自己。他簡單地講述着，並不帶着對過去階級敵人的憤恨。

當他還是孩子的時候，在湖南他的鄉村里，他就受夠了貧困和封建的殘酷迫害。他對自由和知識的渴望，和他的火熱的反抗的性格，使他逃到了一個大城市去。在那裏，他全心全力地做過挑水的苦力，也做過菜販，直到他在粵漢路上得到了一個待遇較好的職業。夜校的學習，和職工運動，提高了他對於社會不平的自覺，這些不平使得中國農民落後；同時也燃起了他那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仇恨。他起先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大革命兩黨合作的時期，他又參加了國民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的『苦迭達』，把他從國民黨中開除出來。他參加了鐵路警衛隊的暴動受了傷，他不得不由一個隱藏的地方，逃出了他的生命。

王震的軍事生活，是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的。像中國歷史上許許多多的農民叛徒一樣，他起先回到故鄉的山野間去組織農民游擊小隊。後來一支支這樣的農民游擊小隊匯集起來，就變成中共的紅軍第

一師。王震就在那裏當了一名上等兵。在動盪的歲月裏，當年輕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強大的國民黨軍隊對抗的時候，王震將軍受過四次傷；在長征中他是中共紅第六軍的政治指導員。這一軍一共一萬二千人，在長征中損失了九千人，王震也不能避免地受了二次傷。

八千五百哩的長征，十二個月差不多是不可思議的堅苦的，和可怕的無停止的戰鬥，彷彿使王震將軍進了參謀學校。他知道他自己已準備着去迎接一定要來到的抗日戰爭。『抵抗民族敵人，早在一九三一年就是我們的真實的目的，』他說。『雖然，我們爲了生存還不得不和國民黨的軍隊對抗着；他們不去抗日，却要來攻擊我們。』

『但是對我來說，內戰在一九三五年就結束了。這一年，當我帶着飢渴的隊伍到達邊區時，毛澤東同志已經發動了統一戰線的運動。由於這個原因，他命令我們，不再向國民黨軍隊發動反攻，雖然，他們還繼續從西安來進攻我們。我當時是一個副旅長，我負責訓練全旅準備對日戰爭，並且在政治上，教育他們和國民黨作統一戰線的合作。當抗日戰爭爆發時，我們已準備好了。有一個時期，的確和國民黨有過真實的合作。我們掩護了正規的國民黨軍隊自北向南撤退，以後，我們自己突進到北方敵人戰線的後面。我把在長征中鍛鍊過的老幹部，作爲由敵後工農義勇軍組成的新的單位的骨幹。我的一旅也長大了。我們在華北和日軍進行很多次戰鬥，直到——』他嘆息着：『我們奉命撤回……』

爲什麼王震堅強的部隊今天不在前線繼續打擊日軍，要回到邊區呢？

第一，他們需要防守延安，抵抗日軍。當時敵人就在黃河對岸，在我們渡河處的北面不遠的地方，佔住了強大的據點，他們時斷時續地企圖渡河進攻延安，他們對於延安似乎比對於重慶更是憤恨。加上當時重慶和延安之間的關係，從沒有像抗戰初期那一短時期的好轉過，共產黨人感覺到，當日軍發動了大攻勢，他們不能將邊區周圍的胡宗南部隊的援助估計在內。

『胡宗南援助過我們？決沒有。』王震說。

第二件工作是保衛邊區，防止在封鎖線邊上的胡宗南部隊的進攻，這些部隊比起共產黨的四五萬的防守部隊，要大十倍。

『我們的第三個任務，』他辛重地說。『保持一個精粹的隊伍，準備配合盟軍對日總反攻。』
到後來，我對於王震的認識是夠了，所以當他表示着對於這麼一天的期望，又非常瞭解地談論着他的部下多麼不耐煩地期待着那樣的一個戰線時——我相信了他。

二 自給自足的士兵

王震和他的一萬人，從前線回來後，還担任了別一件任務。他們得到了另一種勝利，他們有理由來誇耀自己。他們執行了『實行自給自足，減輕人民負擔，領導生產運動』的命令。

王震像是充滿了熱情和活力，當我們來到南泥灣，看見他的全旅士兵在生產戰線上的時候。一個老革命者和戰士表現了全新的面目，像後來我在延安所見到的軍事領袖一樣：他變成了大生產運動的天生領袖，一個墾荒者，和教育者。

在南泥灣，我所見到的一切，使他那動人的故事中每一個字都特別真實和生動了。

『你們已經看見過邊區是多麼貧窮的，』他說。『你們也看見過包圍着我們的封鎖地帶，你們知

道重慶政府從不給我們給養的，你們也明白我們還面對着黃河對岸的日軍。那末，你們一定會懂得：我們從前線回來，困難的道路是排在我們的前面，要我們去選擇——半飢餓地活着，削弱我們自己和戰鬥力，而且以我們的最低要求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或是，我知道還沒有軍隊這樣做過的，自足自給，同時加緊訓練，加緊準備，一有命令就走向前線。

『當時我將這個方法坦白地在我的部隊面前提了出來。我得到了許多不同的意見。他們的心全是傾向着打擊日軍。他們中間的大部份不願意在戰事還在進行的時候去開荒和作農民的工作。我們有許多困難。但是後來我們一致同意：毛澤東同志的命令在客觀上是準確的。只有少數還不全都明白，為什麼我們要在南泥灣的山野上耕作而不回到前線去。』

我想起了另一岸的八路軍逃兵的事，我將宜川緝私機關的首長給我的三張逃兵的證章，交給了王震，同時我注視他的反應。

『是的，這是我的部下。』王震不加猶豫地說，『或許他們就是不明白的幾個，也許他們對於我們的工作覺得太堅苦了。我不大關心他們的逃亡，他們站在那一面來抗日，在我們這面，或是國民黨那裏，這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只要他們參加戰爭的事業。』

他繼續他的故事：

『大約在一百年前，此地回教徒反抗北京清朝所起的大暴動，使這廣大南泥灣區的人口減少了

。山上的土地和山谷的田都荒蕪了。四年前，當我領導着我的隊伍首先發動軍隊生產運動的時候，這裏還沒有爲我們住的窯洞和房屋，沒有食物可買，沒有農具，也沒有願意幫助我們工作的農夫。

『邊區在那個時候是那樣的貧困，我們沒有足夠的糧食和用具。我們從延安政府只得到一點點錢。一開始我們所需的每一件東西都要自己來供給的。我們砍下樹木搭起原始的居屋，還掘了幾個窯洞。我們開墾了一小片土地，才得到蔬菜。我們沒有吃得飽過。』

『爲着交換我們所急需的貨物，我們砍下堅硬的柏樹，賣給村民。因爲週圍區域裏的民衆都喜歡用它做棺材的。你們所通過的那些地方的村長，都幫助我們，從農民那裏借給我們舊的農具，這些農民們也都盡力地幫我們忙。』

『我們的農具問題最後是得到解決了。我的部下，有一個年輕的劉連長，他在山頂上的破廟裏，發現了一只大而古老的鉄鐘；搬下來太重了（不知道是怎麼搬上去的）劉連長就在鐘的下面掘了一個大洞，將它溶化了。我們找到幾個鉄匠，他們教我的部下怎樣從這個大鐘所得到的二千磅的鉄，和從別的村莊所得到的一些廢料來製造農具。』

劉連長得鐘，和怎樣靠了這隻鐘開墾了幾十畝土地的故事，在共區裏已經編成了很成功的舞台劇和秧歌舞；幾星期以後，我們在延安就看見它的演出有高度的熱情和技巧。

『我們製了比我們需要還多的農具。我們廉價售給農民，但是，首先，我們將借來的農具換成新的還給了他們，你們在初次停下來時的冷水岸地方所見到的新的鋤頭，就是由我們軍隊里的鉄匠所製

的。』

『許多困難是要克服的，第一是我自己對生產還不大懂得，我請求我旅中的每一個人，提供他們的知識和經驗，批判和修改我所作的計劃。每一件事，我們一起討論，正好像我們一起做一切工作一樣。在八路軍裏，對戰爭或是工作，只有一個等級的區別，我們的幹部，我們稱為長官，不管做什麼工作，都要比其他同志，工作得更好和更堅苦。』

今天，在南泥灣，有三萬五千畝以上的荒地，都開墾好了。今年，在這廣大的，他們驕傲地稱為：「革命的地產」上，一萬人中的每一個人，平均可出產一·一噸的小米，大米，麥，玉蜀黍，蔬菜，棉花，大麻，和煙草。

每拾個人，養了一頭牛，十頭羊，五只豬。每一隊至少有一百只雞、鴨或是兔子。

王震的隊伍不花費納稅人的一分錢，相反的，他們在各方面幫助了民眾。

在邊區，或是其他敵後抗日根據地，他的部下，和學習他的方法的八路軍其他單位，現在都成了全中國給養最好的軍隊，雖然藥品的供養還是極其缺少，但是由於營養大大改進，生病和死亡率是減少了許多。

對於這種能夠大部自給的軍隊，人民是比從前更加敬愛了，『代替了對貧農的強索和掠奪。』許多農民告訴我，『這些新的兵士却幫助了農民。』

這是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王震給他部下的命令的一部份。

『（一）爲執行毛澤東主席的路線，去年我們糧食生產已超過了賀龍師長所號召的數目的二倍。今年，我們生產目標是去年實收的二倍，但是我們至少要超過三分之一，生產一萬三千噸小米。』

『（二）自三月十日至十月底，確定爲農業生產的時期。由於下雨和耕種，鋤地收穫之間的間歇，將有五十天左右的时间作爲休養，軍訓，和抗日的政治教育。』

『（三）除從事於衛生，工業，和交通工作外；全旅同志，包括幹部（長官）和士兵，都必須平均開墾五畝土地。』

『（四）爲着執行增加生產，保證軍隊和政府給養，兼顧公私利益，建立革命的產業等任務；以求團結人民武裝抗戰與保衛邊區，按照每人平均生產二千四百四十磅計算，下例的生產分配必須爭取完成：百分之三十供養全旅，百分之四作爲自己衣服費，百分之三十三作爲軍隊儲糧；百分之三十三作爲個人收入，可按當時糧價折合現款，投資合作社，匯回家用，或作個人費用。』

『（五）生產運動，在革命事業中，是堅苦的工作。每一單位的幹部，兵士，和政治工作者，必須全部執行任務，團結一致，互相鼓勵和幫助。……』

旅長兼政治委員王震（簽名）『

南泥灣的收成是良好的，將是超過計劃的。但是即使是這樣，也只是達到水準。在一九四四年王

震的一旅不但要做到充分地自給自足，並且還得有一年餘糧。『爲着反攻。』當我問起王震將軍這餘糧的用途時，他鄭重地說：『同時，還得將收成的三分之一供給市場，使兵士可以得到他個人的現金收入。』

『我們的生產還得繼續擴大，每一年我們將開墾更多的土地，』王震說。『戰後南泥灣將供養二萬人民——傷兵，和國民黨統治下的（像河南）災區裏的難民。許多河南飢餓的居民已經偷過封鎖線來到我們的邊區，因爲他們知道我們會幫助他們安居。』（後來我的確看到一大批這種難民。）

在南泥灣的日子，是我在遠東最好的經歷之一。

我們看見一排排穿着白色內衣的人，在開墾着沼澤和乾裂的山地，或且正在耕好了的田裏工作着。『這是連長，營長，或是團長。』王震曾這麼說；同時拉出一個勤勞工作着的人，驕傲地舉起他那因辛苦工作而起繭的手。或是：『他，十二歲就加入紅軍長征，他現在是連長，不論是在敵人之前或是農業生產上，他都是我最好的部下之一。』

我們看見整齊的營房窯洞，餐室和俱樂部，醫院和療養院——這些都是士兵們自己造的。我們看到工作場，這裏殘廢軍人和兵士的妻子在織紡和縫製全旅的制服。我們也看見到鐵店和印刷所，以及製造紙張，肥皂和酒精的小型工場。

我們遇到幾個由王震部下選出來的著名的「勞動英雄」。一個還是穿了八路軍制服的日本戰俘，